

中美话语权竞争的特点

岳圣淞

摘要：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演变的核心特征之一。随着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持续渲染，两国间的权力竞争已事实上从单纯的物质层面提升至观念层面，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中美话语权竞争中得到感知。本文试图探究中美话语权博弈的新趋势，分析双方权力竞争在话语层面呈现出的模式化特点，归纳双方话语权竞争的核心议程，并最终分析其对双边关系乃至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对中美话语权竞争展开深入探究将为理解中美战略博弈态势提供一种区别于物质决定论主导范式下的创新性视角，为把握中美关系未来的演进趋势提供有益启发。

关键词：中美关系；话语权；竞争

作者简介：岳圣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自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对外战略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并在对华政策领域展开大规模结构性调整以来，中美在各领域互动的战略层次、对抗性和激烈程度不断升级，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两国间交往此前数十年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令双边关系面临自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①对此，国际关系学界和战略界始终密切关注着中美关系的演进动态，并普遍认为，中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差距逐步缩小、作为战后长期居于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在不同领域的绝对优势逐步转为相对优势，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情绪不断加剧，进而决议采取更为激进的霸权护持战略以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秩序将不得不面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级重大课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子项目“中国周边战略中的话语与形象构建”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战略决策研究》编辑部及评阅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樊吉社：《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调整与团队转换》，载《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4期，第7-8页。

对中美战略博弈持续的“新常态”，国际关系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将因此增加。^① 基于这一判断，学界近年来从不同角度就中美战略博弈的动因、表现、形式、范围及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梳理既往文献发现，当前的主流研究成果往往聚焦两国战略博弈的物质层面，对诸如观念、身份和话语等非物质因素在双边战略博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关注则明显不足。

在当前的中美关系语境中，随着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持续渲染，两国间的权力竞争已事实上从单纯的物质层面提升至观念层面，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中美话语权竞争的过程中得到感知：自特朗普政府初期对华身份“战略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的塑造、对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界定，以及在一系列涉华议题中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评价，到新冠疫情期间在疫情溯源、国际合作和防控模式等问题上对中国发起的多轮舆论攻势，再到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将中美战略竞争冠以“价值观竞争”之名、并为就此展开的一系列对华政策调整进行合法性论证与政策宣传的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始终试图运用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实践“话语霸权”、依据其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对中国发起系统性的话语攻势以推动其对华叙事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知。^② 在此背景下，为维护自身的国际利益，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话语战略予以回应：一方面，基于一贯的对外理念论证了自身政策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事实为依据有力地驳斥了负面涉华观点、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特定政策立场和举措的理解与支持、维护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面对国际局势持续复杂变动的现实，中国也始终坚持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在多领域国际合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理念和倡议，为凝聚共识、促进区域及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那么，当前中美关系围绕不同领域展开的持续话语交锋呈现出哪些新趋势，双方的权力竞争在话语层面呈现出哪些模式化特点，双方话语权竞争的核心议程有哪些？中美话语权博弈对国际体系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对中美话语权竞争展开深入探究将为理解中美战略博弈态势提供一种区别于物质决定论主导范式

① 凌胜利：《中美战略竞争与大战略博弈》，载《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5期，第71-72页。

② 岳圣淞：《政治修辞、安全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第79-80页。

下的创新性视角，为把握中美关系未来的演进趋势提供有益启发。

一、现有研究及其不足

（一）话语权与国家间的话语权竞争：概念与机理

话语权（discourse power）概念最初源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①时至今日，尽管学界在有关国际话语权的概念界定和分类标准上依旧存在分歧，但在以下几个核心问题上达成了较高共识：第一，国际话语权的基本概念。结合其使用和作用对象、作用领域及影响，国际话语权被认为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以表达诉求、引导舆论、塑造规范为目的，将蕴含特定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话语融入国际公共话语体系的能力体现。^②第二，国际话语权本质上具有双重意涵，是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的统一。前者具有竞争性和动态性特征，与国际体系整体环境和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实力因素相关；后者更多地强调程序性和制度性，其效力的发挥取决于国际社会相关规范准则的制度化水平。^③第三，基于其本质的双面性，可依据功能影响将国际话语权进一步分为舆论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两部分。前者主要体现为“权利”，即主权国家仅凭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成员身份，原则上均应享有平等的对国际事务发表观点、提出建议诉求、解释自身对外政策、维护自我形象和声誉等的发言权；^④后者主要作为话语“权力”形态的承载，是国家凭借自身影响力对不同领域国际规范的塑造和引领能力的体现。^⑤

理想状态下，一国国际话语权水平的整体提升应表现为对舆论性话语

① David Walton,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oing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2, p.154.

② 岳圣淦：《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124—155页。

③ Jorg Balsiger, “The Power of Wor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irth of an Anti-Whaling Discourse—by Charlotte Epstein,”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November 2009, Vol.26, No.6, pp.881-882.

④ Patrica Moy, “Popular 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eptember 2013, Vol.25, No.3, pp.269-270.

⑤ Olivier Schmitt, “When are Strategic Narratives Effectiv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Myths and Strategic Narrativ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18, Vol.39, No.4, pp.491-492.

权和制度性话语权实现统筹、合理、充分的运用,令其得以在协同发展和相互促进中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与国际形象,有效地促进国家意志在国际层面形成广泛共识,正向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认知与舆论环境。^①在大国竞争的场景下,对舆论性和制度性话语权相互关系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国话语权博弈的基本方向:总体上,无论对于霸权国、崛起国还是新兴国家,舆论性话语权都是基本手段,制度性话语权是最终目标。^②但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两种话语权的实践并不总能被清晰的区分,而是以一种有机关联的话语战略得到整体实施:通过国际舆论的引导与塑造,霸权国可以更好地巩固自身国际地位的合法性和话语权威,同时利用特定国际热点问题发起针对崛起国的舆论攻势,通过安全化和污名化等话语战略对崛起国的国际身份、战略意图以及对外行为进行“去合法化”的话语解构,为出台相应遏制政策制造所谓的法理和道义支撑,以降低乃至消除崛起国的潜在威胁。^③在此基础上,霸权国得以在制度构建领域抢占先机,为自身赢得维护体系主导权叙事的话语空间。同时,崛起国更希望借助舆论性话语权展开“无害化”的自我叙事,以应对霸权国的话语压力、营造有利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捍卫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正当权益。^④与此同时,考虑到自身话语权提升的现实困境,为最大限度提升竞争力,崛起国还会基于对国际舆论演化和话语传播规律,主动挑战霸权话语演进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以期通过发挥有限舆论性话语权的“杠杆效应”实现舆论风向的转圜、提升自身话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未来争夺

① 有关舆论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参见刘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内因检视及对策思考——中国对外宣传的技术误区因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74-90页;张新平、庄宏韬:《中国国际话语权:历程、挑战及提升策略》,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10页;王宏仁:《中国话语权意涵: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8-153页;孙萌:《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3期,第29-55页。

② Peter Marcus Kristensen, “How Can Emerging Powers Speak? On Theorists, Native Informants and Quasi-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course,” *Third World Quarterly*, April 2015, Vol.36, No.4, p.637.

③ Edward Newman and Benjamin Zala, “Rising Powers and Order Contestation: Disaggregating the Normative from the Representational,”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7, Vol.39, No.5, pp.871-880.

④ John Heathershaw, Catherine Owen and Alexander Cooley, “Centered Discourse, Decentered Practice: the Relational Production of Russian and Chinese ‘Rising’ Power in Central As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9, Vol.40, No.8, pp.1-12.

制度性话语权奠定基础。^①

对于身处国际社会的国家来说,话语权的重要性甚至高于物质性权力——国际关系行为体间的话语互动被界定为国际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物质性权力与资源需要在社会化的话语互动中被定义、赋值、认可,才能最终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资源。^②那么国家如何通过竞争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后实证主义通过借鉴社会学中的“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ctice theory)回答了这一问题,以“场域互动”视角为国家间话语权竞争提供了解释逻辑:类比于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行为,在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个无形的话语场域作为语言交换的“市场”,交换行为受到类似“看不见的手”的场域规则约束。^③不同国家凭借一定资本入场域参与话语互动,逐渐形成复杂的动态活动关系网络。^④语言在交换中获得意义、产生利润,即话语权。总体来看,后现代话语研究在将话语权概念引入国际关系权力分析视野、丰富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与议程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其反物质主义的本体论倾向和过于“语言学化”的研究路径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在对现实国际关系分析中解释力受限、分析方法可复制性不强的弊端。

(二) 中美话语权竞争:动因与影响

除了理论层面对话语权相关问题展开的探讨之外,国内外学界还基于对现实国际关系演进的考察分析了特定行为体间通过话语互动进行权力争

① Cynthia Hardy and Steve Maguire, “Organizing Risk: Discourse, Power, and ‘Riskificat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6, Vol.41, No.1, pp.80-108.

② Simon Springer, “Neoliberalism as Discourse: Between Foucauld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Marxian Poststructuralism,”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2, Vol.9, No.2, pp.133-140.

③ Diane Vaughan, “Bourdieu and Organizations: the Empirical Challenge,” *Theory and Society*, 2008, Vol.37, No.1, pp.65-81.

④ 场域理论将资本定义为“积累的劳动”,认为对于参与特定场域互动的行为体来说,资本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场域互动消耗资本,同时也获得资本.场域互动的实质是不同类型资本间的兑换与流通.在话语场域中,行为体能够操纵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有形物质资源)、社会资本、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有关场域理论对资本的定义,及其在话语场域中的生成与作用,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高振华、李思宇译:《实践理论大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340页;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50页;David Swartz, *Symbolic Power, Politics, and Intellectuals: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Mustafa Emirbayer and Victoria Johnson, “Bourdieu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Theory and Society*, 2008, Vol.37, No.1, pp.1-22.

夺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层次的分析主要是在现有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的一系列基本假定下展开,主要包含三个核心假定:第一,权力分布的不均等性。尽管话语权被认为是“权力”和“权利”的结合体,但学界对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权力层面,并更加强调权力获取过程的竞争性与排他性。第二,话语权的实践主体为国家,不考虑其他类型行为体在话语权竞争中的角色。限定行为体类型主要是为了简化对话语权竞争过程复盘的难度。在现实国际关系实践中,话语互动往往发生在不同类型的行为体间,且不同话语权施动方会采取差异化策略参与权力互动,令本就难以把握的话语权运作机制变得更加复杂。第三,对话语权竞争现象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实力地位相近、具有区域乃至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之间,而不关注其他国家参与这一过程的可能行为。当前学界对话语权在不同国家间分布的认知依旧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大国权力政治”的基本逻辑,认为国际秩序由大国主导,话语权竞争因而成为大国竞争主导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质是权力的争夺。而对于实力地位处于下游的国家而言,维持生存而非国际声誉或威信才是其核心关切,因此其往往更注重如何确保自身的“话语权利”而非“话语权力”。

正是基于上述假定,学界对中美自21世纪以来展开的持续话语权争夺予以重点关注,并就双方话语权竞争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剖析。在原因方面,学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中美自21世纪以来日益激烈的话语权竞争是中美各自认知趋向转变叠加作用的结果:^①一方面,亚太地区权力格局因中国崛起而发生的结构性改变引发了美国的警觉,为维护其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美国加大了话语资源的投入,力图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合法性叙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制度塑造能力与意愿明显提升,其倡导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合作和融资机制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中国物质实力与影响力的迅速跃升更令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不仅限于物质层面,更在于对其“美式价值观”国际地位与认可度的挑战,^②

① Dosh Ru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21.

② Pan Chengxin and Oliver Turner, "Neoconservatism as Discourse: Virtue, Power and US Foreign Polic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2017, Vol.23, No.1, pp.74-90.

鉴于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关系，美国无法接受其长期致力于推广的“‘普世价值’在受众国认知范畴中出现‘可能的替代选项’”因而要“对任何潜在威胁其‘民主化模式’推广进程的思潮进行基于‘去合法化’的遏止行动”。^①基于此，美国逐渐加大了对华舆论攻势的规模，着手从政治、经济与安全三个方面同中国展开话语权竞争。

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变化令其对自我国际身份的认知出现转变，而与之相对应的对外战略取向调整也需要中国主动提出全新的合法性论述，以确保其自我认知、利益预期和行为趋向相互匹配。基于此，中国采取了比以往更加主动的话语权竞争策略。在对外交往中，中国通过构建常态化信息沟通机制与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渠道，对有关方的涉华关切进行及时回应；鼓励友华国家和国际组织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现身说法、驳斥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对外合作领域的不实言论，为维护自身国际形象与声誉、降低不同国家的对华战略疑虑、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对华政策误判、充实并壮大维护亚太地区话语权结构公平合理的正义力量作出了切实努力。此外，近年来中国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与对外传播领域也取得了积极进展。随着传媒基础设施水平和国际舆论引导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自主构建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在国际舆论场域中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西方视角之外了解和认知中国的关键话语渠道，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②

在有关中美话语权竞争对双边关系乃至国际体系产生的影响方面，学界普遍认为，两国间的话语权竞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双边战略互信下降。^③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前，中美关系之所以能保持长期稳定主要得益于双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秉持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处理矛盾分歧，因此双方的话语互动始终被限定在一个相对温和、保守和建设性的语境中得到推进。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各层级、各领域的常态化沟通渠道始终保持畅

① Chung-Chiu Huang and Chien-Wen Kou, “introduction of the Special Issue- The Asia-Pacific Middle Powers’ Strategic Options in the Era of China-US Rivalry,” *Issues and Studie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ne 2020, Vol.56, No.2, pp.2-4.

② 段鹏、张倩：《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价值维度与路径重构》，载《新闻界》2021年第3期，第28-35页

③ 张文宗、胡畔：《中美舆论战与中国的国际传播》，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1期，第13-15页。

通,为及时消解双边在特定问题上的疑虑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渠道,也降低了战略误判发生的可能性。^①随着特朗普政府开启了对华政策结构性调整进程,中美双方在话语层面的沟通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对抗性,美方对双边分歧和矛盾的协商意愿持续降低,甚至直接切断了中美之间长期维系的大部分沟通渠道。^②对于中国而言,面对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对华强硬举措,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形象,避免国际社会因受到美方对华态度的误导而造成对华认知偏离正常轨道,中方也采取了相应的话语政策予以应对。客观而言,这种具有明显博弈特征的话语行为本身就令双方就共同关切的问题展开沟通、进而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在国际社会看来,中美双方的矛盾公开暴露,双方相互批评甚至“自说自话”进而引发担忧情绪不断蔓延和国际体系的动荡已成为国际话语场域互动的“新常态”。^③

这种趋势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变得更加明显。总体上,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的话语权博弈对两国各自的国际形象、双边关系乃至亚太地区整体秩序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美国自身的国际声誉在新冠疫情期间遭到严重削弱,尽管其在对华涉疫话语权博弈中试图转嫁危机,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其主动挑起的舆论风潮始终不得人心,不仅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身的国际领导力,更间接成为加速亚太地区理念层面“东升西降”格局形成、削弱西方话语霸权的助推力量。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于2020年3月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美国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声誉一直是其国际领导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然而,新冠疫情足以令其终结。美国政策的失败源于对历史的傲慢,特朗普政府迟缓混乱的国内政策和鲁莽自私的对外政策将使美国蒙受数万亿美元的损失,丧失数以万计的本可被挽救的生命。^④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柯尔特·坎贝尔(Kurt

① 左凤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挑战与对策》,载《对外传播》2014年第12期,第47-49页。

② 吴心伯:《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69-175页。

③ 朱锋、常娜:《中美大国竞争与南海话语权建设》,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第120-122页。

④ Stephen M. Walt, "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 March 23,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3/death-american-competence-reputation-coronavirus/>, 访问时间:2022年5月10日。

Campbell) 则认为, 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极大损耗了长期积累的宝贵信誉, “它令世界认识到, 当危机来临时, 美国可能不再有能力有意愿担负起挽救世界的角色, 因而对其失去信心。”^①

其次, 中国在同美国围绕疫情相关议题展开的话语权博弈中, 凭借自身突出的现实抗疫表现和得当的话语策略而获得了影响力的提升, 有力捍卫了自身的国际权益、维护了自身良好的国际形象, 这将在后疫情时代为中国拓展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活动空间, 进一步提升周边塑造能力提供关键的信誉资本。疫情期间, 原有的区域多边机制未能在应对此次危机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区域多边治理体系存在较大完善空间。^②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 中国通过分享经验, 提供物资, 派遣医疗专家, 帮助区域内国家建立或改善了本国的防疫体系, 发挥了关键作用。进入 2022 年, 周边国家疫情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中国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证明了中国作为防疫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可信度与贡献能力, 为探索区域治理合作的中国路径奠定了基础。疫情导致亚太地区公共产品短缺, 制度与架构失灵, 客观上为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创造了条件。以中国路径完善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区域治理体系将会作为未来的一种选择。

最后也应看到, 中美在亚太的话语权博弈对亚太地区整体秩序格局的加速演变产生着持续的重要影响。疫情之下, 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量对中国施行极限施压, 造成中美关系矛盾面和斗争性不断突出, 在对华话语博弈中实施一系列非常规、反常态甚至非理性战略试图构建中国负面的国际形象, 离间中国同其他亚太国家间关系的系列手段的实施正是其核心表现。为了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美国强迫亚太国家在中美两强之间选边站队, 但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并没有产生令其满意的成果。一方面, 中国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 在亚太地区影响力逐日上升; 另一方面, 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 未能充分考虑域内国家特别是其盟国的诉求, 甚至激化了美盟友内部的矛盾。但不可否认, 美国持续升级的对华战略打压也不可避免地将中美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在未来参与区域合作和区域治理的

①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访问时间: 2022 年 5 月 11 日。

② 孙吉胜:《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舆论的新特点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载《当代世界》2020 年第 10 期, 第 4-10 页。

过程中，中美战略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对亚太国家的战略决策产生影响，故而造成区域合作碎片化趋向显现，不利于后疫情时代亚太经济、安全和秩序的恢复。^①

梳理既往文献发现，当前国内外学界已关注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话语层面相关表征，并围绕其形成原因及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但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和国内学界就“话语权”这一概念本质的理解仍存在很大分歧。总体来看，在中美关系的现实语境中，西方学界仍很大程度倾向于将中美之间的话语权竞争视为物质实力竞争的连带现象，并不充分接受话语权这一概念的实质内涵，而坚持认为中美之间在国际事务中是凭借物质实力的背书进行“发言权”（power of say）的争夺。从这一意义上说，并不存在能够衡量和判断中美之间话语竞争输赢胜负、孰是孰非的既定标准，因为双方话语权竞争的核心即是话语标准的制定权和话语意义的裁量权；谁获得了这一权力，就可以将自主构建的叙事确立为国际社会的主导叙事，进而依据这一叙事所体现出的合法性逻辑为自身的对外战略行为提供法理和道德辩护。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物质主义长期主导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而造成的思维定势，令主流研究者并不关注和重视话语的权力意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既往研究缺乏对话语权运作机制的相关研究，即未能明确阐释话语权竞争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其在现实国际关系场景中有哪些可供观测的表现形式。对于中美之间的话语权竞争，学界仍旧缺乏对其互动模式的规律性总结，因而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西方对中美话语权竞争认知的分歧。鉴于此，本文将在这一部分重点阐释中美话语权博弈的演进态势、互动模式和基本特点，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

二、中美话语权竞争的阶段性特征

如前文所述，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权力，话语权的生成和运作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类比于物质性权力的演进过程。事实上，作为国际社会

^① James H. Liu, "Majority World Successes and European and American Failure to Contain COVID-19: Cultural Collectivism and Global Leadership,"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March 2021, Vol.24, No.1, pp.23-29.

最重要的行为体，主权国家所获得话语权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自身的物质实力水平变化存在重要关联性；随着国家物质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其对话语权的需求程度也将随之变化。在中美关系的视域下，这种变化更多地体现在中国这一方。客观而言，美国作为战后长期保持全球霸权地位的主导国，其话语权水平始终处于高位，相较于其他国家甚至于多数国际组织，美国的舆论话语权和制度话语权都具有相当明显的比较优势。^①但对于中国而言则不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经历了显著变化，其对话语权的需求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②

具体而言，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过程中，相较于在舆论和制度话语权领域均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中国的话语权提升进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基本反映出中美话语权博弈的大致脉络：第一阶段是自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在这一阶段处于弱势水平，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将发展对外关系的根本目标设定为维护政权合法性、保护国家安全、最大限度争取国际支持与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聚焦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话语权需求主要体现为对舆论话语权的争取和提升，致力于在西方强势的话语攻势下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辩护，维护自身合理合法的权益不受侵害。在此过程中，中国有限地参与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话语互动，为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发挥了建设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关系出现结构性矛盾，面对苏联日益显露出的“社会帝国主义”倾向，中国认为苏联已事实背离了社会主义路线，故而对其发起批判。此后，中苏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问题在论战，也由此占据了整个60年代社会主义话语场域的核心议程。^③这一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中国参与话语权竞争的一种尝试，但鉴于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展开，尚未产生全球性影响，因而与当前中美之间的话语权竞争仍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开放起至21世纪初。在此期间，中国的综合国力

① 王阳：《美国全球话语霸权是如何形成的》，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25期，第180-182页。

② 陈正良、周婕、李包庚：《国际话语权本质论析——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78-83页。

③ 岳圣淞：《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143页。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而显著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互动与国际机制的意愿明显提升，程度不断加深。基于此，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需求由聚焦舆论话语权逐步转向舆论和制度话语权并重的阶段——中国既需要继续面对西方对华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持续发起的舆论攻势，以避免自身的国际形象与声誉受到威胁，最大限度地为自身争取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又要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国际机制的互动，因此需要在制度领域为自身的权益争取辩护自由。从这一意义上说，中美之间的话语权竞争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初见端倪，特别是在20世纪末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开始不断攀升，获得国际社会瞩目起，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国在地地区事务和国际组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决定通过强化自身的制度主导权来规约中国的对外行为。^①但在此期间，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依旧强调以接触-合作而非遏制-对抗为主基调，因此其同中国之间的话语权互动并未明显地体现出竞争性。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第三阶段是从奥巴马政府后期起至今。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美国接连经历了国内经济疲软，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国内社会动荡等危机，国际声誉不断下滑。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日益上升，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和担忧持续蔓延，特别是在中国于2013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之后，美国开始系统性调整对华战略的步伐，而同中国展开“区域影响力”之争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②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将对外战略资源大幅向亚太地区倾斜，先后出台了“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以制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除了物质资源的投入，美国也同样注重软实力的投资，而实现软实力投资的核心手段即是加强同中国话语权竞争的烈度，拓展话语权竞争的范围。在此背景下，美国一方面开动舆论机器，凭借自身的话语霸权持续渲染“中国威胁论”，意图将中国的国际形象设定为“区域规则破坏者”和“安全威胁”，并对中国发起的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国际合作机制展开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则着手在政治、外交、安

① 吴心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载《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第33页。

② 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34-44页。

全、经济、科技和人文等领域展开制度创设。^①自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先后提出“蓝点计划”“重建美好世界计划”“印太经济框架”等经济合作倡议，在安全领域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形成，在科技领域启动“清洁网络计划”，组建“芯片安全联盟”，在价值观领域发起“民主峰会”。上述一系列举措体现出美国在制度领域同中国展开全方位制度话语权竞争的决心。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根本性转变，未来双方的话语权竞争将逐步由舆论话语权转向制度话语权领域。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美的话语权博弈呈现出的以下三大特点值得关注：第一，话语权博弈场景将更加复杂。中美之间的话语权博弈并非仅在双边层面展开，双方的话语交锋还延伸到了国际组织和区域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场景之中。以中美话语权博弈最核心的作用场域亚太地区为例，中美在不同领域展开的话语权博弈的影响已经扩散至如亚太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盟峰会、亚信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外交场合。^②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2020年底最终签署，中国明确表态将积极寻求加入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进程，未来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多边机制将得到进一步丰富，而这也将为亚太各国参与区域话语权博弈，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提供更多机遇。^③

第二，话语权博弈的层次更加多元。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存在多重维度，不仅包括官方层面的往来，还包括民间交往、非政府组织间互动以及跨国行业产业间的合作关系等。这些复杂的关系网络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各领域互联互通的“软渠道”。^④在中美话语权博弈中，“行业话语”“民间话语”“学术话语”等非官方话语层次在不同场景

①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97-102页。

② Benjamin Zala, “Regionalism and 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Complementary or Competing Forces?” *Asian Studies Review*, January 2021, Vol.44, No.1, pp.61-78.

③ 何伟文：“RCEP和中国加入CPTPP将深刻影响世界贸易和中美贸易格局”，“中国网”，2020年11月24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0-11/24/content_76942999.htm，访问时间：2022年2月14日。

④ Ian Hall and Frank Smith, “The Struggle for Soft Power in Asia: Public Diplomacy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 *Asian Security* (Philadelphia, Pa.), January 2013, Vol.9, no.1, pp.1-18.

下的影响亦不容忽视,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还能对官方话语博弈态势形成影响。如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面对美国单方面不断升级的对华经贸摩擦,美国国内近150家行业协会和近600家跨国公司就曾先后联名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华贸易打压,认为此举将令美国实体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影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并对国际金融市场形成强烈冲击。^①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亚洲多国前政要、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先后发声,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疫情污名化中国,转嫁危机,呼吁国际社会聚焦国际抗疫合作,号召大国发挥领导作用,为中小国家提供抗击疫情的必要协助。^②

第三,话语权博弈的攻守态势或将改变。随着对国际话语权的重视及互动方式的转变,中国开始打破西方国家在涉华问题上对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垄断,以实际行动有力回击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抹黑和无理指责。疫情期间,通过积极利用自身的对外话语传播渠道主动发声,中国得以及时准确地同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分享中国国内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与相关信息,并持续将中国参与国际抗疫合作的具体举措、行动及成效向外界公布。2020年6月,中国在国内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后就向国际社会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③白皮书有力地以事实回击了谎言,展现了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治理领域的贡献及愿景,赢得了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尊重,为扭转疫情初期不利的国际舆论风向奠定了基础。此外,中方还接连发布了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六版防控方案,并将其翻译成多国文字、毫无保留地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疫情防控的理论与实践机制化成果。^④多国因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而令疫情得到有效缓解,中国也因此收获了国际社会广泛肯定与赞誉。^⑤

① Kwan Chi Hung, "The China-US Trade War: Deep-Rooted Causes, Shifting Focus and Uncertain prospects,"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January 2021, Vol.15, No.1, pp.55-60.

② "No Room for Stigmatization in Fighting COVID-19," *China Daily*. Com.cn, March 2020,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003/18/WS5e7178dca31012821727fee3.html>, 访问时间:2022年2月12日。

③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6月7日,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42312/Document/1682143/1682143.htm>, 访问时间:2022年3月22日。

④ 李宇环、向天怡、王红梅:《重大疫情防控的应急体系建设:兼论国外实践的分析与启示》,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9期,第120-121页。

⑤ 彭华新:《科学家在“新冠疫情”议题中的社交媒体参与和权力博弈》,载《现代传播》2021年第2期,第141-146页。

三、防疫问题上的话语权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导致了意识形态之争白热化，而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① 客观来说，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持续蔓延推动了中美话语权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就这一问题在舆论和制度层面展开长时间的话语交锋，而这一过程也深刻地影响了中美两国各自的国际形象与影响力，以及中美关系的宏观走向。

（一）疫情之中的中美话语权博弈

新冠疫情中折射出的中美社会认知差异，使得彼此隔阂越发凸显，呈渐行渐远之势。^② 中国抗疫成功背后的集体主义组织模式，不但不为西方社会所接受，而且其间对比落差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使“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世界更具有舆论市场。同时，美西方国家在集体灾难面前体现的自觉遵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行为逻辑，也让中国社会感到不适。共同的公共安全危机加深了中西方文明及其民间社会的隔阂。^③ 正因如此，对新冠疫情期间中美展开的话语权博弈作全面回顾，对于理解近年来中美关系演进逻辑不可或缺。

1. 美方攻势

自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为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在全球抗疫合作中不负责任言行的指责，美国调集国内政界、军界、学界以及其部分海外盟国话语资源，以空前的强度和范围展开对华负面舆论攻势。自2020年3月起，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新闻发布会和社交媒体发文中开始频繁使用“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指称新冠病毒，声称这是“遵循流行病命名的国际惯例”，为“更准确地定义病毒源头”；^④ 在并无确凿科

① Jeremy L. Hall, "Governance: Struggle and Strife—or Synergy and Success—in the Trans-COVID Er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January 2021, Vol.81, No.1, pp.7-8.

② Frederic Keck, "Asian Tigers and the Chinese Dragon: Competitions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Sentinels of Pandemics from SARS to COVID-19," *Centaurus*, May 2020, vol.62, No.2, pp.311-320.

③ 叶海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亚太地区》，载叶海林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

④ "The Lost Month: How a Failure to Test Blinded the US to COVID-19,"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8/us/testing-coronavirus-pandemic.html>, 访问时间：2022年2月5日。

学依据的情况下作出“新冠病毒源于中国武汉”“新冠疫情是由武汉病毒实验室人造病毒泄露引发”的论断。^①与此同时,德、英、法和澳等国随即跟风配合,不断制造所谓“中国掩盖信息,谎报染病人数,淡化疫情影响”等言论;^②在美国的支持下,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6月发布了一份长达16页的报告,指责中俄在疫情期间“传播虚假信息”并且“煽动阴谋论”,“破坏西方民主制度”;^③同时,美政界和媒体也相继展开规模空前的舆论动员,呼吁国际社会“对华追责”“对华索赔”“对华制裁”的声音不绝于耳。^④

不仅如此,美国还试图将疫情与“人权”“公民自由”“民主制度”等传统反华舆论抓手相链接:面对国内疫情严峻形势,2020年1月23日,中国政府作出封锁武汉对外通道,集中闭环防疫管控的重大决定。这一延续长达71天、人类历史上首次对千万级人口城市实施的危机管控措施,根本扭转了中国国内的疫情态势。对此,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强大执行力和责任担当给予高度评价,“武汉模式”更是在之后多国的疫情防控中被借鉴。^⑤然而,美国政府却批评中国的“封城”措施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并鼓动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媒体针对武汉“封城”期间展开所谓“纪实性”“基于亲历者个人体验”的“独立调查与报道”,^⑥通过拼凑甚至捏造记录以为中国抗疫期间所谓“侵犯人权行为”提供“证据”。^⑦

① “Trump Again Defends Use of the Term ‘China Virus’,” <https://edition.cnn.com/2020/03/17/politics/trump-china-coronavirus/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2年2月6日。

② “List of Shame: US Media Who Took China’s Propaganda Number of Wuhan Coronavirus Cases at Face Value,” April 9, 2021, 2020, <https://townhall.com/tipsheet/juliorosas/2020/04/01/list-of-shame-us-media-takes-chinas-propaganda-on-number-of-cases-at-face-value-n2566139?>, 访问时间:2022年3月22日。

③ “Senators Warren, Duckworth, Hirono Call for Federal Agencies to Address Coronavirus-Related Racist and Xenophobic Attack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Congressional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April 10, 2020.

④ 张志洲:《新冠疫情下的中国》话语处境“与国际话语权建设”,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52-58页。

⑤ “What Asia’s COVID Experience can Teach America,” Nikkei Asia, April 4, 2021,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What-Asia-s-COVID-experience-can-teach-America>, 访问时间:2022年4月5日。

⑥ “Commentary: As the US Plays the Blame Game, China steps up its Global Leadership,” Channel NewsAsia, December 2020,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commentary/coronavirus-covid-19-us-china-trump-xi-leader-medical-supply-eu-12593830>, 访问时间:2021年4月5日。

⑦ 曾向红、李琳琳:《新冠疫情跨国扩散背景下的西方对华污名化》,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5期,第117-135页。

疫情期间,中国始终坚持履行负责任国际大国义务。在国内疫情总体稳定后,中国立即扩大外援规模,向深陷疫情的国家提供物资,增派医疗专家,分享防疫经验。^①相比之下,美国国内疫情短期内大规模蔓延令其无暇亦无力再对他的援助作出回应;尽管美国是中国抗疫物资的主要接受国之一,却仍对中国参与的国际抗疫合作妄加指责,称其为“借助疫情实现地缘影响力拓展的工具”;^②在全球多国新冠疫苗研发取得进展之际,美国一方面以“产能有限”为由对疫苗出口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疫苗安全性提出毫无科学依据的质疑,指责中国利用“疫苗外交”“借机同美国展开影响力竞争”。^③

2021年1月14日至2月10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新冠疫情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工作。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30日发布了《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报告中有关疫情源头的调查结论以详实准确的证据驳斥了西方持续炒作的所谓“病毒实验室泄露说”及“中国疫情源头论”,并指出“在全球多国进行疫情溯源”的重要意义。^④但美方随即对报告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提出质疑,^⑤并纠集13国共同向世卫组织发难;英澳等西方国家媒体纷纷跟进,大肆散布所谓“中国拒绝分享疫情数据”“中国试图对专家组施加压力”等虚假新闻。

① 孙明、孔祥龙:《国际舆论视域下的中国抗疫行动与公共外交》,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5期,第11-页。

② “外交部:美国应对疫情表现既让人费解,也令人深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0年6月30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6/30/content_5522728.htm,访问时间:2022年3月23日。

③ 周鑫宇:《中国的“抗疫外交”:成效与启示》,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第19-34页。

④ “新华国际时评:病毒溯源全球合作,中国开了好头”,新华网,2021年3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3/31/c_1127275243.htm,访问时间:2022年4月1日。

⑤ “China Refutes Blinken’s Charge it Helped to Write WHO Experts’ Report on COVID-19 Origin,” The Indian Express, March 29, 2021,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world/china-refutes-blinkens-charge-7250635/#:~:text=Blinken%20in%20an%20interview%20to%20CNN%20on%20Sunday,coming%20out%20shortly%20by%20the%20World%20Health%20Organisation>,访问时间:2022年4月1日;“US Refuses to Accept WHO’s Findings on COVID-19 in China, to Verify Results Itself,” ANI News,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aninews.in/news/world/us/us-refuses-to-accept-whos-findings-on-covid-19-in-china-to-verify-results-itself20210210183910/>,访问时间:2022年4月1日。

2. 中国对美涉疫话语攻势的应对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舆情形势，为疏导并扭转对华不利的国际舆论趋向，对冲国际负面话语压力，中国采取了全面、积极、连贯而有针对性的话语战略：一方面，坚持以事实为基础，对负面话语议程逐一进行回击。同时，中国摒弃了以往以被动应对为主的舆论策略，开始尝试以逆向推演方式主动揭露西方主导叙事中的所谓“证据”的缺陷和逻辑谬误，向西方话语发起解构挑战。^①为更有力反击西方对华舆论攻击，中国媒体对美国及西方主要国家的疫情动态进行了持续跟踪报道，通过援引大量实时数据并辅以科学系统的分析，结合大量真实生动的案例，以对比视角向外界展示了中西方抗疫行动方式及其成效和影响的巨大反差；^②在美国先后抛出“疫情源头论”和“虚假信息论”等负面对华论调后，中国外交部以及国内主流媒体迅速作出密集反应，围绕美国国内疫情疑点展开了全方位深度报道，其中有关“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重启”“‘赤色传染’疫情推演”“2020美国国内大流感”等话题一经披露，立即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③相较美国在对华涉疫舆论中所采取的歪曲、捏造和污名化手段，中国在对等视角下展开的美国涉疫报道始终坚持以还原事实真相为目标，力求从客观叙事出发引导国际社会深入思考，为中国在不利形势下拓展自身话语空间，确保在话语危机中拥有充分的辩护权和解释权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另一方面，在制度话语权领域，中国自疫情爆发以来始终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凭借自身的大国影响力及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号召力，积极推动涉疫国际合作，鼓励有关方面正视发展中国家疫情防控形势及现实困难，支持国际社会在抗疫资源分配过程中切实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共同

① 包亚兄、石义彬：《社会动员、意义赋予与污名：隐喻在疫情传播中的多重作用》，载《新闻界》2021年第4期，第44-53页。

② 李洋：《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看国际传播着力点——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外舆情分析》，载《对外传播》2020年第4期，第13-16页。

③ “关于疫情，这10个问题请美国政府回答”，中国日报中文网，2020年5月1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005/01/WS5eabc0c8a310ecc9c72b6a44.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23日。

④ 许颖：《新媒体语境下国家形象构建话语博弈策略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载《新闻研究导刊》2021年第1期，第50-52页。

利益和诉求。^①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世界卫生大会、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及巴黎和平论坛等多个国际场合提出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复苏等重要建议，并宣布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中国支持全球抗疫的一系列重大举措。^②

四、后疫情时代的竞争

随着地区疫情防控形势总体趋稳，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美国对华政策的新一轮调整随即展开，中美话语权博弈在未来或将呈现新常态：话语场域互动的主导形式将由疫情期间的舆论博弈转向后疫情时代的制度博弈，议程也将从对涉疫话题的高度聚焦转向在价值观、安全和发展模式等战略性话题上的深度交锋。

（一）人权与价值观问题

围绕“人权与价值观”的话语博弈未来将在美国的推动下成为中美在亚太话语权博弈中的核心议题。^③拜登政府将“价值观外交”视为其推行对外政策的核心手段，为修复因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受损的亚太同盟体系，拜登政府上任之初即提出将重新重视同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的盟友关系，并进一步深化同印度、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伙伴关系，加快建立起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以“捍卫自由世界共同的价值理

① “特稿：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巴黎和平论坛”，中华网新闻，2020年11月28日，https://news.china.com/zw/news/13000776/20201128/39015225_all.html#page_2，访问时间：2022年3月23日。

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6月7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42312/Document/1682143/1682143.htm>，访问时间：2022年3月22日。

③ Sarah H. Cleveland, “A Human Rights Agenda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JIL unbound*, January 2021, Vol.115, pp.57-62.

念”。^① 中国崛起及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跃升被美国视为是其主导价值观的最大威胁。随着“东升西降”趋势的加速演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新兴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自信也正不断提升；对于很多亚洲国家，特别是在文化背景和历史经历上同中国存在密切联系或相似性的国家而言，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其吸引力正逐渐增强；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周边政策越发呈现出积极主动的一面，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网络不断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推动或参与的亚太地区诸多领域合作中得到实践，“文明对话”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亦不断深化；此次疫情期间，中国在区域抗疫合作中发挥了事实领导作用，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区域治理领域的制度维护、制度引领乃至制度创设的能力^②——在美国看来，亚太地区话语权博弈的本质是零和博弈。为维护自身话语地位，重振亚太国家对美信任，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拜登政府以“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普世人权观”为基础，在集结亚太国家壮大所谓“民主同盟”的同时，也开始布局新一轮的对华话语攻势。

自2021年年初起，美国政府对华以“人权”之名展开的新一轮打压初见端倪：在中国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后，美国国务院当即宣布在前任政府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下做出更新，进一步扩大对华官员制裁名单，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指责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颁布实施的香港国安法及修订的香港选举制度是对“香港人权和自由的侵犯”，并称美国政府将同盟友及伙伴国加强协调，共同追究“中国政府破坏民主制度的责任”。^③ 4月8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推出一项长达281页，名为《2021年战略竞争法》的法案。法案呼吁政府加强对“普世价值”推广领域投入，授权一系列“人权

① Joseph R. Biden, “Remarks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Special Edition 2021’ and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at-the-munich-security-conference-special-edition-2021-and-exchange-with-reporters>, 访问时间:2022年3月29日。

② 于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卫生合作》,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45-150页。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ress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J. Blinken: Hong Kong Autonomy Act Update,” March 17, 2021, <https://www.state.gov/hong-kong-autonomy-act-update/>, 访问时间:2022年4月1日。

和公民社会”措施，在对华政策中加大对香港、新疆等地区事务的“介入程度”，加强同台湾当局的所谓“伙伴关系”等。^①

在持续炒作“香港问题”的同时，美国还连同加拿大、英国和部分欧盟国家就涉疆问题展开对华“人权危机”的话语攻势：3月22日，欧盟27国、英国和加拿大分别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宣布对有关个人及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同日，美、英、加三国外长发布联合声明表达“对中国新疆人权问题持续的深切关注”。声明还强调“透明度和问责的重要性”，呼吁“中国允许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独立调查员、记者和外交官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进入新疆”，并称“美、英、加三国将继续团结一致，揭露中国违反人权的行径”。^② 针对美国及西方部分国家假借“人权”之名在国际舆论场中持续推动的对华打压态势，中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强烈谴责、有力驳斥和坚决反击。鉴于美西方对华“人权外交”攻势或将长期持续，未来中国更应着重防范其扩散效应对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领域核心利益产生的“关联式”负面影响——在这一方面，自2021年3月起持续发酵的“新疆棉花事件”值得深入思考。应当看到，在这一看似由国际行业协会挑起并得到大量跨国企业响应，以抵制新疆所谓“强迫劳动”“侵犯人权”为名，试图限制新疆棉产品进入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行动背后，是美西方国家凭借在相关行业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优势，以全新的“经贸问题人权化”手段实施对华遏制的体现。^③

（二）南海问题

中国同南海有关国家围绕南海海域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久已有之。自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美国就不断强化自身作为“亚太国家”的身份定位，反复强调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重大核心利益”。作为域外国家，美国自知对南海问题突然高调介入本身缺乏

①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Chairman Menendez Announces Bipartisan Comprehensive China Legislation,” April 8, 2021,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chair/release/chairman-menendez-announces-bipartisan-comprehensive-china-legislation>, 访问时间：2022年4月9日。

②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edia Note of the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oint Statement on Xinjiang,” March 22,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xinjiang/>, 访问时间：2022年4月1日。

③ “Interview: BCI’s Boycott against Xinjiang Cotton Groundless, Politically Motivated, Says Pakistani Expert,” News from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Daily Bulletin, April 2, 2021.

说服力，固而试图通过议程扩展和安全化等手段主观建构合法性依据，大肆渲染所谓“南海不安全”和“南海航行自由受阻”。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并推行“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的打压态势有增无减。随着中美各领域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华遏制程度日益加深，“南海议题”已成为美国对华构建“全面威胁”叙事的重要一环。^①

基于此，美国将中国界定为“制造南海紧张局势”“扰乱地区安全”的根源，并以中国同南海有关国家的争端为抓手不断炒作，导致南海议题在国际舆论界迅速升温。不仅如此，美国还鼓动以菲律宾和越南为代表的南海声索国前台发声，煽动悲情民族主义以博取国际社会同情；纠集其他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组成针对南海问题的舆论同盟予以声援，不断壮大舆论声势，凭借全球传播力和话语影响力进行大规模舆论动员：一方面依托对国际法有关条款和相关国际规范的片面解读从根本上削弱中国作为当事国的抗辩权益；^②另一方面，建构南海声索国的“小国受害者”身份，不断对“中国妥协让步”这一情景展开推演自述，刻意避开对事件解决过程中程序合理与合法性的讨论，设置“大国风范”舆论陷阱以达到从道义上绑架中国立场表达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西方舆论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是否妥协”同“中国是否遵守国际规范与国际秩序”两个问题相混淆，“中国南海霸凌论”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并持续受到国际关注，令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陷入一定程度的被动。^③

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初，受新冠疫情影响，南海问题并未立即成为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领域博弈的核心议题。自2021年年初起，美国的南海政策行动密集展开：2月9日，美国“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海实施军演。这是拜登政府就任后美国首次在南海以“双航母模式”显示军事存在。此后截至3月底，在拜登政府执政仅3个月的时间内，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已达到每月一次的频率，且规模和活动时长不断增长。^④同时，美国就“南海问题”在话语层面的对华施压也相应跟

① 张志洲：《南海问题上的话语博弈与中国国际话语权》，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第126-134页。

② 余敏友：《美国南海政策的新发展及对我国的挑战——评蓬佩奥南海声明》，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第5-19页。

③ 杨悦：《大国竞争与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政策》，载《美国研究》2020年第6期，第89-109页。

④ 胡波：《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1期，第74页。

进：1月27日，美国务卿布林肯在同菲律宾外长的通话中扬言称“中国对南海某些海域主权的主张超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允许的范围，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并表态“面对中国的压力，美国和东南亚声索国站在一起”。^①3月24日，布林肯在北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称，中国在南海实施军事化行动“正在威胁南海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号召亚太和欧洲盟国共同抵御“中国破坏国际规则，威胁美欧集体安全，价值观与繁荣的行为”。^②

可以预见，未来拜登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将很大程度延续前任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立场，通过采取“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行动模式拉拢东盟国家、印太周边国家以及域外盟友在南海共同抵御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各种手段为“准则”磋商制造干扰和障碍，阻止中国同有关国家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规划南海未来的秩序格局。^③在美国持续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背景下，不断增加的参与方将令未来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博弈态势更趋复杂。

（三）地区发展与秩序问题

在地区发展与秩序方面，中美两国在亚太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各自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对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和吸引能力上。中国提出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议国家之间兼容并蓄、共同发展，这与美国将所谓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人和助推政治集团生态的行为难以找到观念上的交集。为此，两国均始终致力于主动构建并维护关于自身发展模式优越性的叙事，并试图将其整合进有关地区发展与秩序的制度话语体系中。面对中美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的现实，两国围绕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叙事将在未来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合法性论断”之争。相较于中国总体趋于内向、包容的自我叙事，美国对其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和区域秩序观的推广话语具有明显的外向性、排他性和进攻性——在当前形

①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adout of the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Secretary Blinken’s Call with Philippine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Locsin,” January 27,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s-call-with-philippine-secretary-of-foreign-affairs-locsin/>, 访问时间:2022年4月1日。

② “Blinken on NATO”, VOA Editorial, April 2, 2021, <https://editorials.voa.gov/a/blinken-on-nato/5838836.html>, 访问时间:2021年4月3日。

③ 傅岷成:《美国的政策转向与南海形势新动向》,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3期,第28-44页。

势下,中美两种叙事的差异集中体现为“美攻中守”的话语倾向:中方的多边合作话语始终强调“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并不排斥其他竞争话语的存在;相比之下,美国的多边合作话语不仅包含对自身优势的突出与强化,还包含对竞争话语的排斥与解构。^①

基于此,美国在有关亚太地区发展模式的话语权竞争中始终坚持推动“双向话语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则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多边机制展开负面话语建构,抹黑攻击中国提出合作倡议的动机是为“将他国利益同自身利益进行深度捆绑”;^②极力唱衰倡议前景,指责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存在所谓的机制“不合理”“不透明”“不成熟”等问题;^③大肆渲染其所蕴含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技术风险,呼吁参与国为避免“被华渗透”或陷入“债务陷阱”而应拒绝中国的资金和项目。^④另一方面,凸显甚至鼓吹美国主导的合作模式的优越性、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对标“一带一路”的相关要素强调美国模式在透明度、财务可持续性、环境标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竞争力。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为增强同中国在亚太地区发展模式方面的竞争力,美国在其推行的“印太战略”中特别规划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议程。从拜登政府就任以来的政策行动来看,美国已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对亚太地区发展趋势的引领作用,认为其对亚太多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建计划“正令中国在区域大国竞争中获得优势”。^⑤因此,未来美国将很有可能加大对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地区合作与发展模式竞争。在此过程中,美国将继续利用其国际话语权优

① 毛维准:《美国的印太基建攻势:演变、逻辑与局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90页。

② Alice De Jonge, “Perspectives on the emerging role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93, No.5, pp.1061-1084.

③ 钟飞腾、张帅:《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20-64页。

④ Barack Obama, “Remarks Following a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f Japan and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February 22, 2013,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following-meeting-with-prime-minister-shinzo-abe-japan-and-exchange-with-0>, 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

⑤ Yang Xiangfeng, “US-China Crossroads Ahead: Perils and Opportunities for Bide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anuary 2021, Vol.44, No.1, pp.129-153.

势对中国的合作倡议及中国在既有区域合作机制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打压，同时加大对亚太国家的劝导与扶持力度。

五、结论

客观来说，相较于物质因素的可感知、可测量性，非物质因素的影响往往并不直观，且难以把握和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可以被忽略。在现实国际关系的互动中，国家间交往乃至竞争的本质被视为一种权力争夺，但权力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并不总能与物质实力水平形成对等配比进而得到客观衡量；在物质权力之外，获取以话语权为代表的非物质性权力同样是国家维系自身在国际社会中合法性生存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而言，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时代积极参与中美话语权博弈不仅是其作为负责任大国为捍卫地区秩序公平正义，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利益而须承担的国际义务与责任，更是其确保自身利益及合理合法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护良好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的必然选择。^①而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延续疫情期间在地区话语权博弈中占据的主动优势，将合作抗疫精神转化为后疫情时代促进区域各领域合作的动力，为中国自身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支撑，为中长期发展营造总体有利的国际制度与舆论环境，需要在深刻把握国际舆论和话语制度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展开主动的话语战略谋划，加强对国际话语权演进趋势、作用机理及其影响的研究。

^① 陈曙光：《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力逻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第35-40页。

China-US Competition in Discourse Power: Features, Evolution and Agenda

Yue Shengsong

Abstract: The intensifying China-US competi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vious literature focusing on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has emphasized the material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le ignored non-material factors such as identity, concept and discourse. As a matter of fact, comparing with material power, non-material power, represented by discourse power, is also an irreplaceable pattern of power which guarantees the legitimized existence of a nation st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for China-US relations, amid the upgrading competi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ver a wide range of areas, their competition in discourse power poses key impacts not only on the evolu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ut also on regional order as well as global power distribu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duc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performances and agendas of China-US competition on discourse power,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making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in face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optimized tactics in obtaining its due share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Key Words: China-US Relations; Discourse Power; Competition

Author: Yue Shengso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vergence in polic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owards China

Yang Yousun; Yin Chunjiao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erentiated, including their policies towards